

品鉴北朝造像技法 参悟魏碑艺术源流

——魏碑主题研学活动小记

本报记者 梁有福



参加研学实践活动的学员在石窟前合影

前不久，由云冈研究院和大同市魏碑研究院联合开展的“品鉴北朝造像技法，参悟魏碑艺术源流”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成功举办。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党委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大同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杜晓霞及54名学习魏碑书法的中小学生和家参与此次活动。

本次研学活动旨在通过参观云冈石窟和《鲁迅收藏佛教拓片艺术展》，使学员深入了解北魏佛教造像雕刻技法和魏碑起源，切身感悟魏碑艺术精髓。

前，在云冈研究院金牌讲解员的带领下进入洞窟参观。针对青少年好奇心重、求知欲强的心理特点，讲解员用生动的语言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与雕刻艺术，以及洞窟中现存题记的艺术特点和历史意义。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学们对北魏文化与云冈碑刻题记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激发了学员们的求知欲。他们不时提出各种问题，讲解员认真作答。

参观完洞窟，40多位书法爱好者与杭侃、崔晓霞、杜晓霞围坐在昙曜五窟前的广场上，杭侃向学员们介绍了云冈石窟的基本概况，分析了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特点

和“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杜晓霞讲解了此次文化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崔晓霞与学员们进行了互动问答。

云冈研究院向学员们赠送了研学书籍《带你游云冈》（学生版），以及制作精美的文创手帐本，现场气氛欢快而热烈。

随后，学员们来到云冈博物馆，参观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云冈研究院主办的《鲁迅收藏佛教拓片艺术展》。通过讲解员的详细介绍，学员们了解了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期间的收藏以及所做的美育教育活动，观赏了鲁迅先生抄录的

碑帖、书法作品，以及收藏的山西石窟寺与造像碑拓片。大家在博物馆书法互动区挥毫泼墨，书写出一幅幅魏碑书法作品。在一笔一划间感受魏碑的美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次研学活动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同时也揭开了云冈研究院与大同市书法家协会未来合作的新篇章。双方表示，作为同属于大同地区的文化研究机构，今后会继续在北魏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弘扬等领域开展更多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为大同文旅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与云冈研究院互赠图书



张焯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赠送图书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近日，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与云冈研究院在云冈图书馆举行图书互赠仪式。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陈高潮，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雕塑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陈云岗，北京百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卓，北京讯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莫庸，中国文促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王伍，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副院长何建国、闫丁参加互赠仪式，张焯主持。

张焯对陈高潮社长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云冈图书馆持续收集国内外多种文献资料，已基本形成适应各学

科科研需求的文献收藏体系和服务体系。此次赠书提供了经典藏本，进一步丰富了云冈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有利于加强学术研究，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

陈高潮介绍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他希望双方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实现图书资源共享，促进院社共赢。

陈云岗认为，通过此次图书互赠，可以促进相互了解，加强信息交流，强化院社间的协调合作。

王卓、莫庸分别作交流发言。

陈高潮代表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向云冈研究院赠送《大般若波罗蜜多经》（50卷）；张焯代表云冈研究院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赠送《中国大同雕塑全集》。

“北京文投”与云冈研究院签约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小霞）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云冈石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4月20日上午，北京文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云冈研究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北京文投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海红、副总经理陈刚、业务一部副总经理李静，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院长杭侃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在云冈研究院举行，该院党委

委员、文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主持仪式。

张焯与卢海红分别致辞，杭侃与卢海红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秉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市场互动、共促发展”的原则，建立云冈石窟文化开发合作机制，发挥资源互补、凝聚荟萃、创新引领作用，围绕云冈石窟展览展示、衍生品开发、文化传播、活动交流等开展深度合作。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上)

韩府

云冈石窟自北魏开凿以来，已历时一千五百余载，纵览此间之古代文献、遗存碑铭及近人文章、土人口传，其名称竟有数十种之多，诸如：灵岩寺、武州山石窟寺、恒安石窟、北台石窟、云冈洞、大庙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不加以审订辨证，规范厘定，极可能在研究中出现张冠李戴等错误。因而，对目前所能见到所有名称逐次进行考释，有助于云冈石窟研究者阅读古籍和近现代文献。

对云冈石窟所有名称加以归纳，略作剖析，发现可以分为“名”与“称”二种。所谓“名”，即较为正式、规范、通行的名号，一般得到过官方认可，或者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所谓“称”者，即指那些随意指定的、不甚通行的、口头使用的称呼。以当前为例，“云冈石窟”为“名”，此外其余一切称呼如“云冈石窟”“大同石佛”“大庙”等则均为“称”。再者，分析云冈石窟历代名称的结构和来源，发现多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或者是自然地理名称，或者是行政区划名称，后一部分则是表示性质的通名，如“石窟寺”“石窟”“寺”等。这种定名方式与逻辑学上的属概念加种差的定义方式相仿，是通过通名加以限定以构成专名。前者如“武州山石窟寺”，以石窟所在地的自然地理名称限定；后者如“恒安石窟”，以石窟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划定的名称限定。其三，名称中带“寺”，或不带，随时间和使用者之不同，含义不同。民国以前似无差别，至本世纪以来，有的著述中略作区别，带“寺”者包括石窟前木构建筑，不带“寺”者，仅指石窟及其内部雕刻，成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大

同人士厉寿田所著《云冈石窟源流考》即是如此。解放以后，称云冈石窟，其所指又同于古代，一般包括窟前建筑——窟檐及其他附属物。近年来，不少学者又在文章中加以区分，透过表面，可以看到这其实是一种研究深入以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区分越来越精密细微。这是研究深化的一个标志。

兹将较为常见和重要的云冈石窟名称依次考释如下：

武州（周）山石窟寺 武州（周）山石窟佛寺

北齐人魏收所撰《魏书》中或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称“武州山石窟佛寺”，此外尚有径称“石窟寺”者，有人以为亦指云冈石窟。如：“（皇兴元年）八年秋八月丁酉，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太和七年）五月戊寅朔，幸武州山石窟寺。”（北魏·《魏书·高祖纪》）此类记载尚有条，兹不一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同卷中另外一条：“（太和八年）秋七月乙未，行幸方山石窟寺。”（同上）中华书局校本将此句在“方山”与“石窟寺”中点开，其意必以“石窟寺”为“武州山石窟寺”或“武州山石窟佛寺”之简称，与此类的是显祖的一段记载，“十有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北魏·《魏书·显祖纪》）实则此二处标点在未见其它更有力证据之前，当以存疑为妥。《魏书》因为年代久远，先时辗转传抄，以后版本歧出，表示同一事物的名词使用也不够规范一致，甚至在同一卷中的同一名词也不统一，前者如《显祖纪》称“武州山石窟寺”，而《高祖纪》中又多出一“佛”字，成了“武州山石

窟佛寺”，到了《释老志》中又称“灵岩寺石窟”，后者如《高祖纪》中便有所不同，六年三月的记载称“武州山石窟寺”，而下文到了七年五月便又成了“武州山石窟佛寺”，莫明其妙地多出一个“佛”字。方山附近原鹿野苑范围内的小型坐禅石窟的重新发现，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此处石窟以方山或鹿野苑命名似乎都无可。因而，以上的标点问题难以遽下结论。另外还需补充两点：一，武州山有的文献也作“武州塞”的同义词使用，如日本人民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便是如此；二，山名“州”字或作“周”，可能与避讳有关，详情待考。

灵岩寺 灵岩寺石窟

《魏书》中记载：“景明初，世宗诏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北魏·《魏书·释老志》）又，《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就而凿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处之“灵岩”显然系灵岩寺之简称，因上句中有“佛寺”一词，此即古文“承上省”例。上述二处文献中之“灵岩寺”均指云冈石窟。再看《水经注》之记载：“其水东转，迤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漯水》）笔者以为，表面上看，“灵岩”似为一自然地理名称，是对云冈石窟所在山冈的指称。但仔细玩味此处文义，实则不然，仍是灵岩寺之简称。故而“灵岩寺”之名，不不同于前之“武州山石窟寺”，亦不同于后之“云冈石窟”，不是因所在地而得名。就是说，尽管云冈

石窟有灵岩寺之称，但切不可以为石窟所在山丘亦因石窟而得名“灵岩”。

恒安石窟 北台石窟

《续高僧传》记载：“释昙曜……以元魏和平元年任北台昭玄统，绥辑僧众，妙得其仁，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又曰：“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故于北台石窟集诸德僧，对天竺沙门，译《付法藏传》并《净土经》，流通后贤，意存无绝。”（唐·道宣《续高僧传·昙曜传》）此两处之“恒安石窟”、“北台石窟”均似为“称”，而非名。称“恒安石窟”乃是行政区划上与洛阳的龙门石窟区分，称“北台石窟”则是为了与南台石窟——伊阙石窟相区别。“北台”为“北台石窟”之简称。称“恒安石窟”系因北齐后，云冈属恒安镇所辖——六镇起义后，平城废，北齐时建恒安镇。

石窟寺

唐天宝年间宋旻曾作五古一首，名为《题石窟寺》，诗题下注曰：“即魏孝文之所置。”可知，唐代有“石窟寺”之称。需要说明的是，此名不可认为系由“武州山石窟寺”等名简化而来，因中国历史上径称“石窟寺”者比比皆是。宋旻之诗收入《文苑英华》和《全唐诗》中。

石佛寺 佛窟山

清·雍正《朔平府志》记载：“左云县石佛寺，在县东九十里云冈堡，又名佛窟山。”（雍正《朔平府志·古迹》）石佛寺之名亦同上述石窟寺，当系全称，而非简称，理由亦同上。盖由径以“石佛寺”为名者，遍布全国。佛窟山或系民间俗称。

云冈文创精品展台



祥瑞飞天晴雨伞

藻井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大型建筑的顶部装饰，主要用于佛坛上方最重要部位。汉代建筑中，已有藻井装饰，南北朝时期多有使用，也出现于石结构建筑中。云冈石窟的藻井图案主要出现在第七、八、九、十、十二窟等大型洞窟，多为“斗四”“斗八”藻井，其外圈一般为方形。

云冈祥瑞飞天晴雨伞的图案选自第七窟后室窟顶的六方藻井。在保持洞窟原貌的基础上，为适合伞的外形，在中心位置做了装饰性设计。枋子相交处饰团莲，枋上刻飞天，每方“斗四”式藻井的圆心雕团莲，四周绕以体态丰满的飞天。八朵团莲皆

为素面莲房，外饰双重莲瓣。其间四十八身飞天头梳大髻，上身袒裸或著斜披络腋，下身均穿羊肠大裙。有的翩翩起舞，左顾右盼；有的手捧莲蕾，合掌祈祷；有的两两成组，窃窃私语；有的共托摩尼宝珠，充满憧憬。整个画面充满丰富的艺术想象，置身伞下，如在洞窟中。

作为石窟装饰的形象资料，云冈石窟装饰图案的每种纹样都各具特色，布局严密且描绘精细，既相互联系，又可以作为独立的图案类型。祥瑞飞天晴雨伞借鉴云冈石窟的图案美学，是一次古为今用的尝试。

王晨